

民族地区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研究 —以重庆武陵山区为例

何悦

(长江师范学院财经学院, 重庆 408100)

摘要: 旅游城镇化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重庆武陵山区民族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 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分析民族地区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探讨不同特征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感知的差异性。结果表明: 民族地区农户认为旅游城镇化带来的积极影响要远远大于消极影响, 而且对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感知都要大于社会影响和生态影响; 不同年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民族差异的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基于此, 本文从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旅游城镇化和生态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 以期促进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 旅游城镇化; 民族地区; 武陵山区; 影响感知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877(2021)01-0114-06

A Study on Farmers' Perception of the Impac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 Case Study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Chongqing

HE Yue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Tourism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field survey data of Chongqing national regions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s from three aspects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analysis of farmer's perception of the impact on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national regions, through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explor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easant household perception difference influence on tourism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ink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negative impact,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 is greater than the social impact and ecological impact. Farmers with different ages, income levels, education levels and ethnic differenc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impac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ethnic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 Tourism urbanization; Ethnic minority areas; Wuling Mountain areas; Influence perception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为贫困地区, 其脱贫攻坚工作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2]。武陵山区民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复杂, 经济发展缓

慢, 贫困问题尤其突出, 但其特色的民族文化、秀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为该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3-4]。

澳大利亚学者 Patrick Mullins 于 1991 年首次提出“tourism urbanization(旅游城镇化)”的概念^[5], 奠定了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业和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基础^[6]。在我国, 以旅游业为主导或者支柱产业来促使城镇化发展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

收稿日期: 2019-0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MZ099);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6XJC790005);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16SKGH187)

作者简介: 何悦(1988-), 女,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为突出^[7-9]。杨建翠研究认为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具有强大的推进作用^[10];王兆峰等分析了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机制^[11]。现有文献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融合、旅游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和机制等方面,但鲜有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研究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农户作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人,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水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参与行为,进而影响到区域城镇化进程。基于此,本文通过对重庆武陵山区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当地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探讨不同特征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感知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1 研究区域发展概况

武陵山区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涵盖湘、鄂、贵、渝四个省市地区,属于我国老、少、边、穷的典型区域,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资源丰富,因此旅游城镇化也是武陵山区促进农户减贫增收的重要路径。重庆武陵山区位于重庆市东南部,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之一,包括黔江、武隆、石柱、彭水、酉阳和秀山六个区县,辖区面积为2.3万平方公里,2017年户籍人口373.36万人,城镇化率40.19%,远低于重庆市平均水平。2017年重庆武陵山区共接待旅游人数8 528.8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5%;旅游收入585.41亿元,比上年增长32%。游客接待数量和旅游收入增速喜人,但当地农户贫困现象仍然十分明显。

2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2.1 问卷设计

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武陵山区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主要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农户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政治面貌、民族和职业等基本信息;二是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主要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该部分主要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基本同意,5=完全同意。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8年11~12月在重庆武陵山区的实地调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共发出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70份,问卷有效率为94%。运用SPSS 22.0统计软件,采用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对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被调查者基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从性别来看,主要以女性为主,占总样本人数的62.98%;从年龄来看,主要集中在41~60岁这一年龄段,占总人数的74.89%;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91.91%,说明当地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政治面貌来看,共有136名党员和334名非中共人士,分别占总人数的28.94%和71.06%;从收入水平来看,月收入低于1 000元的被调查者人数居多,占总人数

表1 被调查者基本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项目	类别	人数(人)	占比(%)	项目	类别	人数(人)	占比(%)
性别	男	174	37.02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268	57.02
	女	296	62.98		初中	164	34.89
年龄	≤20	6	1.27		高中/中专	26	5.53
	21~40	62	13.20		大专/本科及以上	12	2.56
	41~60	352	74.89	政治面貌	党员	136	28.94
	>60	50	10.64		非党员	334	71.06
收入水平 (元/月)	≤500	146	31.06	是否为少数民族	是	248	52.77
	501~1000	166	35.32	否	222	47.23	
	1001~1500	86	18.30	是否从事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工作	是	42	8.94
	1501~2000	50	10.64		否	428	91.06
	≥2000	22	4.68				

的66.38%;从民族来看,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分别为222人和248人,分别占比47.23%和52.77%,说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汉化现象较为明显;从职业来看,未从事旅游及相关产业工作的被调查者占绝大多数。这些人的调研结果,能够更真实反映当地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

3.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利用SPSS 22.0软件对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的量表进行Cronbach's α 系数信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样本的总体可靠性检验统计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3,各量表测量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处于0.777~0.914之间,均在0.7以上,说明各量表对应的观测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各量表内部结构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然后,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对测量量表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变量的KMO值处于0.601~0.872之间,均大于0.6,且Bartlett球形检验

显著性为0.000,说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所设计的量表效度较好。

3.3 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

3.3.1 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经济影响的感知

从表2看出,积极经济影响总均值为4.13,消极经济影响总均值为3.41,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农户对于旅游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积极经济影响感知要强于消极影响。从积极影响来看,大部分农户都认为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农户的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并且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其中,“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均值最高,说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的确给当地的发展带来显而易见的变化。从消极影响来看,“促使当地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获得62.98%的赞同率,说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农户的基本生活。

表2 民族地区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经济影响的感知

变 量	均值	赞同率(%)	不确定率(%)	不赞同率(%)
积极的经济影响	4.13	78.13	17.19	4.68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4.25	82.55	14.47	2.98
增加当地农户的就业机会	4.15	80.00	13.62	6.38
提高当地农户的收入水平	4.12	77.87	18.30	3.83
提高当地农户的生活质量	3.96	70.64	23.40	5.96
帮助当地吸引更多的投资	4.16	79.57	16.17	4.26
消极的经济影响	3.41	48.51	31.63	19.86
促使当地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	3.75	62.98	27.23	9.79
拉大当地农户的贫富差距	3.33	45.11	33.19	21.70
外面经营者对本地经营者存在挤出效应	3.16	37.45	34.47	28.09

注:赞同率为“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之和,不确定率为“一般”,不赞同率为“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之和,下同

3.3.2 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社会影响的感知

从表3看出,积极社会影响总的均值为4.10,消极经济影响总均值为2.68,可以看出民族地区

农户对于旅游城镇化发展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感知要远远高于消极的社会影响。从积极影响来看,大部分农户都认为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可以提

表3 民族地区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社会影响的感知

变 量	均值	赞同率(%)	不确定率(%)	不赞同率(%)
积极的社会影响	4.10	80.85	11.49	7.66
提高当地的社会知名度	4.31	88.09	9.36	2.55
有利于当地农户接触新思想和新文化	4.13	81.70	14.04	4.26
旅游城镇化发展促进民族文化的开发和利用	3.61	66.38	9.79	23.83
加强当地农户与外界的交流	4.17	83.40	13.19	3.40
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	4.28	84.68	11.06	4.26
消极的社会影响	2.68	24.96	28.94	46.10
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	2.53	19.57	26.81	53.62
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2.81	28.51	30.21	41.28
当地宁静的生活氛围被破坏	2.71	26.81	29.79	43.40

高当地的社会知名度、有利于当地农户接触新思想和新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加强当地农户与外界的交流以及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其中,“提高当地的社会知名度”和“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两个指标得分最高,说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对武陵山区民族地区社会知名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较为显著。而“旅游发展促进民族文化的开发和利用”这一指标的非赞成率高达23.83%,说明由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部分地区民族文化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因此,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对民族文化的合理开发和传承。从消极影响来看,虽然“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当地宁静的生活氛围被破坏”三个指标处于中立状态,但赞成率都没有超过一半。说明旅游城镇化发展在带来积极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持续发展的隐患,需要在以后发展过程中加以重视。

3.3.3 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生态影响感知

从表4看出,积极生态影响总均值为3.66,要低于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消极影响总均值为3.10,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农户对于旅游城镇化发展带来积极的生态影响感知略高于消极的生态影响。从积极影响来看,超过60%的农户认为旅游城镇化的发展使当地政府和农户的生态保护行为、当地环境保护措施更完善。仅有40.85%的农户认为旅游城镇化的发展使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提升,这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通过政府、农户等具体行为来快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也是后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从消极影响来看,“当地的垃圾数量不断增加”这一指标有58.72%的农户持有赞成态度,说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确实给当地带来较大的污染,这也是我国旅游地的普遍现象,应该进一步加强治理和管理。

表4 民族地区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生态影响的感知

变 量	均值	赞同率(%)	不确定率(%)	不赞同率(%)
积极的生态影响	3.66	58.83	24.04	17.13
促进当地政府的生态保护行为	3.84	66.81	23.83	9.36
促进当地农户的生态保护行为	3.80	61.28	29.79	8.94
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提升	3.14	40.85	17.45	41.70
促使当地环境保护设施更完善	3.85	66.38	25.11	8.51
消极的生态影响	3.10	29.86	33.76	29.22
绿色开发占用了大量土地,造成用地紧张	2.85	2.34	41.28	34.89
当地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	2.87	28.51	34.47	37.02
当地的垃圾数量不断增加	3.57	58.72	25.53	15.74

3.4 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感知的差异性分析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农户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感知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见表5和表6。不同性别的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基本一致,女性对

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积极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感知水平要明显高于男性。农户是否为少数民族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感知无较大差异,但是对三个方面消极影响的感知具有显著的差异,少数民族农户消极影响的感知要明显高于非少数民族,这可能由于少数民族对当地民族文

表5 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感知差异的独立样本t检验

基本特征		经济影响		社会影响		生态影响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性别	男	4.07	3.38	4.06	2.67	3.74	3.02
	女	4.16	3.43	4.13	2.69	3.61	3.14
是否为少数民族	是	4.10	3.57*	4.15	2.77*	3.66	3.17*
	否	4.16	3.24*	4.05	2.59*	3.66	3.01*
是否从事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工作	是	4.17	3.24	4.06	2.63	3.60	2.87
	否	4.12	3.43	4.11	2.69	3.66	3.12

注:*表示平均值差异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6 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感知差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基本特征	经济影响		社会影响		生态影响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年龄	≤20	4.06	3.27	4.05	2.66	<u>3.60</u>	3.15
	21~40	4.18	3.48	4.11	2.67	<u>3.62</u>	3.18
	41~60	3.98	3.20	4.24	2.83	<u>4.15</u>	2.52
	>60	2.93	2.78	2.87	2.67	2.42*	2.44
收入水平(元/月)	≤500	3.96	3.44	3.90*	2.75	3.54*	3.24
	501~1000	4.13	3.51	<u>4.14</u>	2.78	<u>3.49</u>	3.20
	1001~1500	4.28	3.35	<u>4.29</u>	2.67	<u>3.87</u>	3.02
	1501~2000	4.13	3.36	4.04	2.52	3.66	2.80
	≥2000	4.07	3.48	4.00	2.42	3.48	2.00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3.93	4.00	4.30	3.44*	3.92	3.22
	初中	3.43*	3.39	3.88	2.89	3.73	3.19
	高中/中专	<u>4.15</u>	3.49	4.06	2.85	3.79	3.21
	大专/本科及以上	<u>4.17</u>	3.39	4.11	<u>2.64</u>	3.64	3.08

注:组内带*的均值与下划线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化更具有归属感,对消极的影响感知更为敏感。农户是否从事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工作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基本一致,无显著差异,但是从事旅游及相关产业工作的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感知要低于其他农户。

不同年龄段的农户对经济和社会积极和消极影响、生态消极影响的感知差异并不显著,但对于生态积极影响感知的差异性显著,年龄大于60岁的农户感知要明显低于60岁以下的农户,老年人更多时间都待在邻近区域,对生态环境的积极影响感知较弱。收入水平低于500元的农户对积极社会影响的感知要明显低于501~1500元的农户,对积极生态影响的感知略高于收入为501~1000元的农户,但低于收入为1001~1500的农户。初中学历的农户对积极经济影响的感知要明显低于高中(中专)和大专(本科)以上学历的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的消极社会影响感知要高于大专(本科)以上学历的农户。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对重庆武陵山区民族地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民族地区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分析结果表明:(1)旅游城镇化给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都带来了影响,其积极影响要远远大于消极影响,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都要大于社会和生态影响。(2)从经济影响来看,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较为肯定,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受教育水平和

是否为少数民族等特征对其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异。(3)从社会影响来看,农户认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较为显著,对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呈中立态度;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是否为少数民族等特征对其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异。(4)从生态影响来看,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感知略高于消极影响,年龄、收入水平和是否为少数民族等特征对其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异。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旅游城镇化发展的收益分配机制。政府、企业在开发旅游项目时,优先聘请当地农户参与到项目开发和运营中,解决少数民族农户的就业问题,提高其收入水平。另外,政府需加强对少数民族农户的技能培训,包括市场意识、现代化经营、服务水平等方面,通过长期有效的培训,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主动积极地参与和融入当地的市场竞争。第二,推动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通过积极的引导和教育,使少数民族农户正确认识现代文化,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指导当地产业的发展,利用现代文明改进不良的生活习惯。另外,全面认识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尊重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旅游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和传统,结合现代发展理念,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和项目规划。通过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推动旅游城镇化的发展。第三,促进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高旅游开发商、游客和当地农户环境保护

意识,合理规划开发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充分考虑民族地区资源的独特性和环境承载力。积极完善旅游地的基础设施配套,加快垃圾、污水等污染物的处理,提高当地生态环境质量。

参考文献:

- [1] 熊正贤.富民、减贫与挤出:武陵地区18个乡村旅游样本的调查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5):77-88.
- [2] 王志章,王静.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5):89-97.
- [3] 沈超群,陈凯.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的趋避冲突及其对策分析—以阿坝州为例[J].理论与改革,2015(1):66-69.
- [4] 赖晓华,聂华,滕汉书.西部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探讨[J].贵州民族研究,2014,35(7):134-137.
- [5]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 [6] 杨建斌.陕西商洛地区农家乐旅游产业发展研究[J].东北农业科学,2018,43(5):55-59.
- [7] 杨艳霞,宁小彬.城镇化背景下黔东南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融合发展模式探析[J].旅游纵览,2017(6):149-150.
- [8] 王兴贵.旅游导向的四川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以甘孜州为例[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7,26(1):40-48.
- [9] 昌晶亮,余洪.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16,36(6):204-208,141.
- [10] 杨建翠.民族地区旅游推动城镇化发展研究—九寨沟县旅游城镇形成机制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33(4):137-140.
- [11] 王兆峰,龙丽羽.时空视角下的旅游业驱动城镇化机制分析—以张家界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33(3):364-368,378.

(责任编辑:王丝语)

(上接第74页)氟吡甲禾灵 EC 0.68 L/hm²对野黍防治效果为96.93%,且对大豆安全,与人工完全除草区产量无显著差异,比不防治区增产56.62%。

由于我国大豆种植区域广,杂草区域组成差别大以及除草剂多年使用所引起的抗药性增强,使部分杂草很难防除^[13]。野黍是一种抗药性较强的早春杂草,在长春地区,大豆出苗后野黍同期出苗,若在野黍三叶期前施药,大豆处于子叶期,容易造成药害,若在大豆2片复叶期结合防治阔叶杂草一起施药时,野黍已达4~7叶期,抗药性明显增强,烯禾啶、精喹禾灵等除草剂都无法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14]。因此对野黍的防治需要把握好关键施药时期,并且选择正确的药剂和用量,苗前封闭处理可选用96%精异丙甲草胺EC,苗后茎叶处理可选用10.8%高效氟吡甲禾灵EC。

参考文献:

- [1] 董莉环,崔娟,吴磊,等.酸模叶蓼对大豆生长的影响及其经济阈值[J].中国农学通报,2017,33(15):15-20.
- [2] 曲耀训.大豆田杂草危害与化学防除[J].山东农药信息,2015(4):17-20.
- [3] 崔娟,董莉环,吴磊,等.同期稗草对东北春大豆生长的影响及其经济阈值[J].大豆科学,2016,35(6):992-996.
- [4] 关成宏,董爱书,李海燕.黑龙江垦区杂草群落演变情况分析及防控要点[J].现代化农业,2018(9):2-5.
- [5] 韩德新,刘宇龙,芮静,等.不同除草剂对大豆田反枝苋的防除效果研究[J].东北农业科学,2016,41(5):79-82.
- [6] 贾金蓉,马诚义,马红,等.野黍种子休眠特性及破除方法[J].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4):88-91.
- [7] 席振海,胡远富,于文,等.大豆田恶性杂草—野黍的防治[J].现代化农业,2002(12):9.
- [8] 郭玉莲,黄春艳,黄元炬,等.15种除草剂对野黍的防治效果[J].杂草科学,2014,32(1):127-129.
- [9] 黄春艳,陈铁保,王宇,等.高效盖草能加助剂对野黍防除效果的评价[J].杂草科学,2005(2):41-43.
- [10] 马红,马诚义,贾金蓉,等.野黍对烟嘧磺隆的抗性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8,49(1):47-55,73.
- [11] 朱诗禹,崔娟,徐伟,等.精异丙甲草胺苗前封闭处理对大豆苗期生长及其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J].植物保护学报,2016,43(4):677-682.
- [12] 何付丽,陈丽丽,郭晓慧,等.稀禾啶、烯草酮等6种除草剂对不同叶龄期野黍的防治效果比较[J].作物杂志,2013(1):112-116.
- [13] 王义生,徐研,董珈奇,等.噻吩磺隆对苘麻的活性测定及对大豆的选择性试验[J].东北农业科学,2017,42(4):27-29.
- [14] 于文.恶性杂草野黍防治技术[J].现代化农业,2007(6):7.

(责任编辑:刘洪霞)